

二十五史

新编

清史

(一八四〇年前)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十五史新编

清 史

新撰者 冯元魁

出版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者 上海中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56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6

字 数: 196,000

印 数: (平)5,000 (盒)5,000

版 别: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325 - 2293 - 8/K · 255

定 价: 13.3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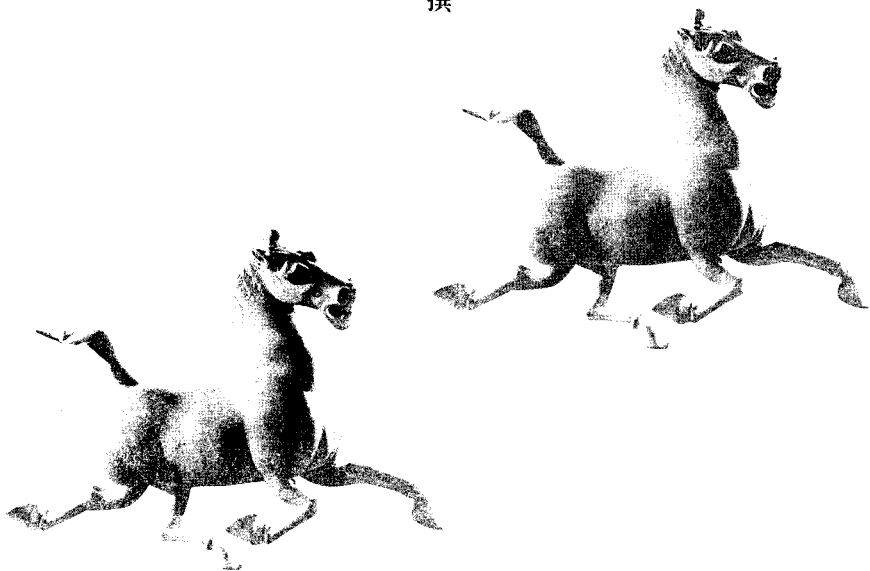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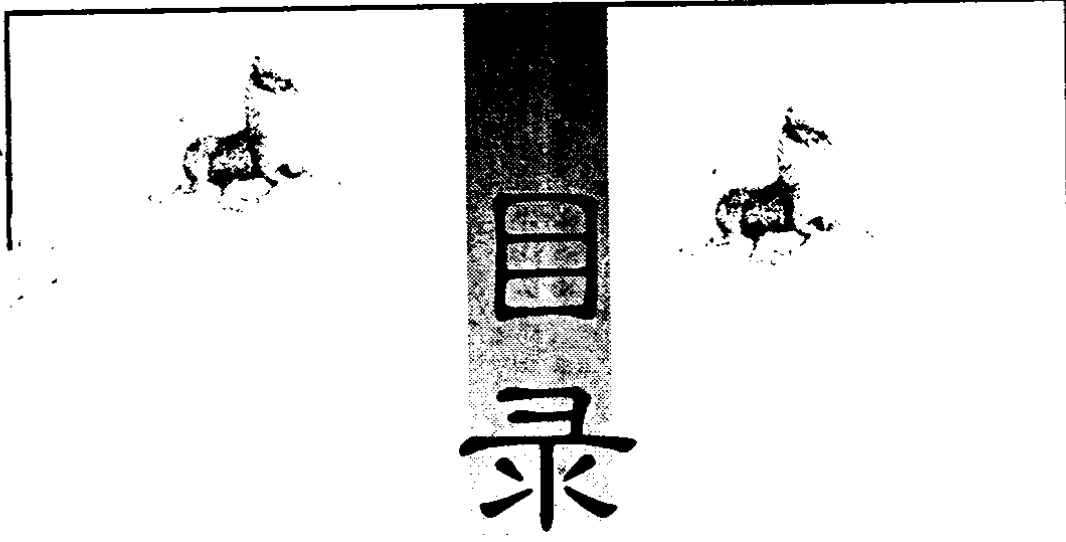
清史

(一八四〇年前)

冯元魁

新撰





目录

纪事	5
传记	27
传记第一 努尔哈赤 皇太极	27
传记第二 顺治帝	40
传记第三 孝庄文皇后 多尔袞 济尔哈朗 多铎 ...	46
传记第四 范文程 洪承畴	61
传记第五 冯铨 魏裔介	69
传记第六 康熙帝	76
传记第七 鳌拜 吴三桂	83
传记第八 于成龙 熊赐履	90
传记第九 靳辅 陈潢	97
传记第十 施琅 赵良栋	102
传记第十一 张伯行 李光地 赵申乔	109

传记第十二	顾八代	王鸿绪	118
传记第十三	汤若望	南怀仁 杨光先	124
传记第十四	班禅四世	达赖五世	130
传记第十五	黄宗羲	顾炎武 王夫之	135
传记第十六	阎若璩	毛奇龄 王士禛	144
传记第十七	万斯大	万斯同	151
传记第十八	雍正帝		154
传记第十九	允祥	鄂尔泰 张廷玉	161
传记第二十	年羹尧	岳钟琪	170
传记第二十一	朱轼	李卫 田文镜	178
传记第二十二	纳亲	张广泗	187
传记第二十三	孙嘉淦	策棱 福敏	195
传记第二十四	乾隆帝		204
传记第二十五	和珅	刘统勋 刘墉	211
传记第二十六	傅恒	于敏中	220
传记第二十七	沈德潜	纪昀	226
传记第二十八	嘉庆帝		231
传记第二十九	杨遇春	松筠 汪廷珍	236
传记第三十	惠栋	戴震	244
传记第三十一	钱大昕	段玉裁	249
传记第三十二	王鸣盛	章学诚	254
传记第三十三	郑燮	龚自珍	259
志			263
志第一	政治制度		263
志第二	经济		274

志第三	文化	281
志第四	社会生活	288
表		291
表第一	清帝系	291



明清之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崇祯末年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迅猛发展。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军攻下襄阳后称大顺王,攻占西安后建立大顺国;崇祯十七年(1644)一月发布讨明檄文,李自成率百万大军向北京进发。三月十七日,兵临北京城下,十九日崇祯帝于煤山(景山)自缢,农民军进入北京,明王朝被推翻。

在沈阳的满洲贵族利用中原剧变的政治形势,加快入主中原的步伐,摄政王多尔衮打出“救民出水火”的旗号,于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七日祭天伐明;亲佩“大将军印”,率领满洲、蒙古八旗大军,九日启行,十三日兵至辽河。此时,奉命回师靖皇的宁远总兵吴三桂率军至京郊丰润,得知北京陷落的军报即退兵至山海关,并致书多尔衮,乞求“速选精兵”入关“灭流寇于宫廷”。多尔衮复书以“必封故土,晋为藩王”为条件,诱降吴三桂。二十一日清军同李自成军激战于一片石,二

十二日清军至山海关,吴三桂开城门出迎,大军入关。大顺军被清军和吴三桂军击败,李自成退军回京,四月二十九日匆忙登基称帝,第二天撤离北京西行。多尔袞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命他与清将阿济格、多铎绕道北京,追击李自成军。五月二日,多尔袞率领清军进驻北京城,由于清军打着“为尔等复君父仇”的旗号,得到地主阶级和明朝遗臣的拥护,北京局势很快恢复正常,官复职,民复业,明朝在北京及近郊的大小衙门为清统治者所承袭。

八月二十日,顺治帝御驾从盛京(沈阳)启程,宗室公主、太宗后妃及满、蒙王公大臣,在銮仪卫、旗鼓手前呼后拥之下,于九月十九日浩浩荡荡进北京城,自正阳门入皇宫。当日满汉群臣上表劝进顺治帝定鼎燕京,即帝位。

十月一日,顺治帝率群臣于天坛祭告天地,即大清皇帝位,颁诏天下,定鼎燕京,建号大清,纪元顺治,行“大清时宪历”,一代新朝正式建立。

明王朝覆灭以后,在南方的朱姓藩王和南逃的明朝遗臣,先后建立了几个南明小朝廷:在南京,福王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唐王朱聿键和他的弟弟朱聿鐭分别在福州、广州称帝;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建立永历政权。顺治二年(1645)春,清军占领潼关、西安,李自成大顺军败局已定,多尔袞命多铎率军东转大江南北。四月十三日,清军攻克江北重镇徐州,南京福王政权一片恐慌,沿江守将不敢迎战。四月十八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督师史可法坚守阵地,加强防御,以挡清军于长江以北。多铎几次致信史可法,劝他启城门迎降,史可法复信表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严辞拒绝。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史可法被俘,多铎再次劝降,他大义凛

然地说：“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史可法被清军杀害。史可法牺牲以后，在他的无畏精神激励下，扬州军民众志成城，同入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直到人亡矢尽。清军屠城十日，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古城毁为废墟。

五月九日，清军占领南京门户镇江，福王深夜出逃芜湖。五月十五日，多铎率领清军进入南京，弘光余部纷纷“奉舆图册籍”降清，第一个南明小朝廷宣告灭亡，福王朱由崧被他的臣下刘良佐从芜湖押回南京，作为投降清军的见面礼。清军攻下南京以后，六月底由常州、无锡直取苏州，七月初杭州不战而得。清军南下，势如破竹，到顺治三年（1646）几个南明政权除在西南的桂王永历政权外，均为清军所灭，清王朝统治全国的统一局面已经为期不远了。

清军在江南推行了屠城、强制汉族人民剃发易服的民族高压政策，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著名的有江阴、昆山、嘉定等地人民抵抗清军的英勇斗争。

顺治元年十二月，清政府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为由，下令将北京附近州县的无主荒地“尽行分给”开始圈地，次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圈占土地，范围波及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顺治七年（1650），再次掀起圈地，范围扩展更大，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十二府州县的所谓“无主荒地”都成为满洲王公、勋臣的庄田。清统治者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总数达十五亿亩至二十二亿亩。

随着圈地令的推行，清政府又宣布“贫民无衣着者”，“准入满洲家为奴”，实际上强迫大批贫苦汉民充当八旗贵族和兵丁的奴仆，这就是所谓的“投充法”。被迫为奴的汉民以逃亡作为反抗斗争的主要形式，各地有大量奴仆逃跑，导致庄田荒

荒,圈占的土地成了荒田。因此,清政府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还设“兵部督捕衙门”,专门缉捕“逃人”。被捕获者轻则鞭百,重则臂上刺字,窝藏者处死,籍没其家产。

清统治者在京畿推行圈地、投充、逃人法,是把关外的农奴制生产方式强制在中原地区推行,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加深了民族矛盾。

顺治十八年正月(1661年2月),二十四岁的顺治帝福临在养心殿去世,他的第三子玄烨即位,次年(1662)为康熙元年。康熙帝年仅八岁,按先帝遗诏由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镶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鳌拜(镶黄旗)四大臣共同辅政。

其时,清王朝统治已历十七年,满洲贵族也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并且推行了一系列封建化政策,社会日趋安定,经济也有所发展,这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四位辅政大臣虽不是爱新觉罗宗室,但都是功臣贵戚,满洲贵族中旧势力的代表,他们妄图阻止清王朝封建化趋势。康熙初年,四辅臣一反多尔衮、顺治帝推行的封建化政策,竭力保留旧的制度、旧的传统,要把清王朝的历史车轮拉回到关外时期的老路上去。政治上,在“率祖制,复旧章”的旗号下,撤销内阁和翰林院,恢复内三院。科举考试废八股文,只用策论,还减少进士名额,以堵塞汉族知识分子入仕的途径。经济上,重新推行圈地。鳌拜集团于康熙五年(1666)提出,多尔衮在圈地时偏袒正白旗,不符合祖宗定制,要求镶黄旗与正白旗互换土地。“互换”的借口下再度掀起圈占土地的逆浪,圈换土地三十一万垧(一垧为十五亩),迁移壮丁六万余人,造成十万人民流离失所,中原社会生产又一次遭到破坏。

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老,遏必隆软弱,苏克萨哈原是多尔衮的亲信,不掌实权。鳌拜最为跋扈,与其弟穆里玛以及羽班布尔善、阿思哈等满洲贵族结成死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中广植党羽。他甚至盗用康熙帝之名“出矫旨”,斩杀异己,根本不把康熙小皇帝放在眼里,恣意妄为,独断专横,俨然以清王朝的太上皇自居。

康熙六年(1667)康熙帝亲政,鳌拜集团仍把持大权不放。康熙帝虽然年轻,但他雄才大略,决心从鳌拜手中收回权力,因而在皇帝周围逐渐集聚了一批得力满汉大臣,掌握机要。这股反鳌拜集团的中坚力量,以康熙帝为核心,以德高望重、足智果断的孝庄皇太后(康熙帝的祖母)为后盾,积极部署粉碎鳌拜集团的行动。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指挥“布库”(满语摔跤)少年在皇宫逮捕了鳌拜,又以三十条罪状将他永远拘禁,其他党羽多被处以极刑。康熙帝在清除鳌拜势力以后,立即宣布永停圈地,平反冤案,鼓励百官上书言事,开始了清朝政治史上的新时期——康熙时代。

清朝取代明朝统治全国,降清汉官功不可抹,其中以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功劳最为显赫。至康熙年间,吴三桂镇守云南,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镇守福建,尚可喜镇守广东,史称“三藩”。他们各拥重兵,掌握地方的军事、行政、财政大权,犹似三个封建割据的独立政权。

三藩之中吴三桂力量雄厚,野心最大,拥兵十万以昆明为根据地,势及云南、两湖。他向各地派遣党羽,开矿产、铸钱币、造武器、囤粮草、征苛税,招兵买马积极准备武装叛乱。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尚可喜上疏请求养老辽东,由儿子尚之信袭平南王爵,七月,吴三桂、耿精忠也假意向朝廷上疏,请求

撤藩“以探朝旨”。康熙帝清醒地注意到三藩势力膨胀对政局的严重威胁,早有撤藩的考虑,当吴三桂撤藩疏上达朝廷时,就顺水推舟,立即批准,命令三藩回到自己的老家,将地方行政移交有关总督、巡抚管辖。

撤藩令下,吴三桂于当年十一月杀云南巡抚朱国治举兵叛乱,并向尚之信、耿精忠统治地区发出檄文,要他们跟着叛清。吴三桂在各地的党羽也纷纷起兵加入叛乱行列,一年之间叛乱波及十一个省的广大地区,“东南西北,在在沸鼎”,尤其在物产丰富的两湖、江西、两广、云贵的极大多数地区为叛军占领,军事上取得暂时的优势。

吴三桂叛乱之初,清政府措手不及,军事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劣势地位。年轻的康熙皇帝亲自指挥平叛战争,调度全局,谨慎部署,采取“剿抚并用”分化瓦解三藩营垒的方针,把打击重点放在吴三桂方面,宣布凡归降兵将“往事一概不究”,并且“即与保全,恩养安插”。同时,康熙帝破格提拔了一批忠于清朝的汉族绿营将领,安置在前线的指挥岗位,加强了清军的战斗力。

经过二年多的平叛战争,到康熙十五年(1676)夏,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东西两个战场捷报频传,一些参予叛乱的干将如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等纷纷倒戈降清,收回了大片土地。康熙十七年(1678)春,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称帝,国号大周,年号昭武,并大封文武百官以稳住阵营。当年秋天,吴三桂做了几个月的皇帝一命呜呼,孙子吴世璠从云南赶往衡州奔丧“即位”,改元洪化。吴三桂死后,湖南、四川相继为清军收复。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从湖南、广西、四川三路发兵,入云南,包围昆明,叛军负隅顽抗。九月,绿营将领赵

良栋指挥清军围城数重,吴世璠服毒自杀,叛军开城迎降。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彻底失败,吴三桂尸骨传至各省示众。康熙帝平定三藩叛乱,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愿望,为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

康熙帝亲政以后,清除鳌拜集团,平定三藩叛乱,清朝统治政权更加巩固,社会经济也得到初步的发展。在新形势下,国家的统一已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统一台湾的条件已经成熟。

顺治十八年(1661),杰出的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二十多年间,台湾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郑成功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郑经和孙子郑克塽继续统治台湾,虽然对开发台湾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郑氏集团由“抗清复明”而逐渐走上割据独立的道路,失去了台湾军民的支持。康熙二十年正月郑经死,子克塽嗣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康熙帝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开始了统一台湾的步伐,命令福建总督姚启圣“统辖福建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施琅率战舰三百多艘,水师二万余人,浩浩荡荡向台湾进发。郑氏集团坚守澎湖企图阻止清军进攻台湾,经过激战,清军于十八日攻占澎湖,台湾已失屏障。郑克塽考虑再三,决定向清朝投降。一个割据政权,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也可以说对祖国领土完整与统一作出了贡献。八月,清军进驻台湾,当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师”(《靖海志》卷四),统一台湾得到人民的拥护。台湾统一以后,康熙帝对郑氏集团采取了宽大政策和热情欢迎的态度,下命令说:“尔等从前罪过,尽行赦免,仍从

优叙录,加恩安插。”“郑克塽等欢呼雀跃,望阙叩头谢恩”。随即清政府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建立了地方政权,隶属于福建省,巩固了东南海疆。

十六世纪以来,俄国开始向外扩张,征服西伯利亚后,势力伸张到我国黑龙江流域。明清之交,俄军筑雅克萨城占领我国尼布楚地区。康熙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1682—1686),康熙帝派出清军两次从俄军占领下收复雅克萨城,俄方被迫达成在尼布楚谈判的协议。康熙二十八年(1689)九月七日中国和俄国使臣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中段的边界线,这是清政府第一个与外国政府代表以谈判方式达成的边界协议,因为缺少谈判经验,错误地把尼布楚划到俄国一边。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履约刻石立碑于边境线上,同时还建立了一套勘查边界制度,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

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是清朝前期的一项重大的经济措施,并且收到很好的效果。康熙帝亲政以后,把三藩、治河、漕运作为治理国家的三件大事,书写在寝宫的柱子上,日夜思考。

黄河下游河道经河南,从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汇合。河道长年失修,淤沙堵塞,堤防不坚,经常泛滥决口,河南、安徽、江苏年年闹水灾。据统计,顺治年间黄河大的决口达十五次;康熙元年至十六年决口达六十七次之多。广大地区受灾,房屋冲塌,人畜淹死,良田成了泽国。黄河、淮河、运河相交于苏北一隅,黄河泛滥,殃及淮河,两河大水注灌运河,运河阻塞,南北水路交通运输被切断。清朝政治中心在北京,经济重心在南方,因此,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不仅是物资运输的大动脉,而且也是清政府运兵的主要干线。运河梗阻,一旦发生政治动乱和经济危机,清政府就会束手无策。康熙

帝所以把河务列为头等大事之一,其主要原因就是“济运通漕”关系着京师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

康熙十六年(1677)平定三藩叛乱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康熙帝下了大规模治理黄河的决心,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总理治河工程。靳辅是位很有才能的水利专家,他走马上任,来到黄河两岸,视察地形,摸索水情。所到之处“无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等人,凡有一言可行者”,“莫不虚心采择,以期得当”。经过“周度形势,博采舆论”的实地调查,他连续向康熙帝上了几个疏奏,报告了治河规划。靳辅的治河规划谓之“治河八要”,主要是:疏下流、治上流、修堤岸、堵决口、筑坦坡、划经费、裁冗员、设河兵。康熙帝断然批准了靳辅的治河规划,靳辅即赴河南观察康熙元年黄河决口的遗迹。在途经邯郸时,他在吕祖祠发现一首没有署名的壁诗,诗文表达了作者对治河的豪情壮志,引起了靳辅极大的兴趣,当即派随从找到了壁诗的作者。此人名叫陈潢,字天一,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对祖国的河流变迁、水性特点颇有研究,并且博览古今治水著作,又重视实地考察,对于治理黄河胸有全局,是一位杰出的水利专家。从此陈潢成了靳辅治理黄河的得力助手,各项重大工程都由他设计和监督施工。

靳辅、陈潢治河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康熙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677—1683),主要工程是堵塞决口,加高加固堤岸,促使河水归原来流向倾入大海。在河南至江苏的河道中筑减水坝,在决口处开引河,以缓水势,然后把决口合拢。数年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口基本堵住,黄河复归故道。积水泻泄后,大片土地涸出成为可耕良田,治河初见成效。第二阶段是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七年(1683—1688)间进行。工程向上游

转移,在河南境内筑修堤岸达 8529 丈,确保上游河道按故道流向下游。在第二阶段中,还进行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程,就是开凿中河工程。过去运粮的漕船在运河中航行,出江苏清口以后,要行经 180 里的黄河,因风涛险恶,常常发生沉船事故。在黄河以北开凿中河,漕船在黄河中只行驶 20 里,就可进入中河,中河与黄河并行,然后进入北运河。这样避开了黄河险道,不仅提高了运输效率,而且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损失。

在治河工程进入疏通海口阶段时,清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还夹杂着党派斗争。康熙帝误认靳辅卷入党争,革了他的职。陈潢也被逮入狱,病死在狱中。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帝又起用靳辅,可惜他复职不到一年也因积劳成疾和精神上的打击,死于任上。靳辅、陈潢为治理黄河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值得后人敬仰。

康熙帝在指挥治河工程中虽有过失,但他多次视察河工,直接了解治河情况,反映了他治理国家的务实精神,作为封建社会的帝王也确是难能可贵的。

康熙时期治理黄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不能全面根治,但是效果还是很显著的,对于运输与耕种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治理,黄河“水归故道”,运河“漕运无阻”,苏北沐阳、海州、宿迁、桃源、清河五县原来被黄水淹没的一片汪洋,今涸出土地三百万亩,成为可耕良田。

从康熙到乾隆年间,热河西岸(今河北承德)建造了一座雄奇秀丽的山庄,作为清帝的避暑胜地,今称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帝初建,乾隆帝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建。清朝建造避暑山庄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目的。康熙帝几乎每年都有半年的时间住在这里,一般五月来山庄,九、十月返北京。据历史文献